

二

与此同时,应该考虑的课题是,从民族主义的束缚中把日中战争史研究解放出来。民族主义的束缚是什么?这种束缚就是,把日中战争简单地看作是民族之间的对立,有把日中战争描绘成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战争的倾向。当然,对于中国来说,日中战争不言而喻带有民族解放斗争的因素,而且正是在日中战争时期,在学术上和社会上明确界定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整个日本民族都是侵略者,也并不意味中华民族都是抵抗者。事实上,在日本和中国,都有各种各样的势力。在日本,当然有鼓吹侵略战争的势力,但同时也有想要避免战争的势力。在中国,当然有推动抗战的势力,同时也有尝试做另外选择的势力。而且,日中战争,是在日中两国与欧美、苏联等的复杂关系中,作为全球历史的一环展开的,不综合全面把握这些复杂关系,就不能历史地深入理解日中战争。

最近比较普遍地把日中战争定位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环,意义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明确地带有盟国团结在一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反法西斯势力的战争,可以从这个角度以宽广的视野来定位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概念本身也是历史地形成的,并不能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特征。如果我们只是根据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来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很难认清它同时带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另一面。反法西斯势力建立的法国人民战线政府没有放弃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印度支那民族解放斗争也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只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就不能解释类似现象。

三

最后要注意的一点是,过分地强调革命的意义,会带来负面影响。诚然,对于理解中国近现代史来说,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1949年革命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过于强调这些革命的意义,会出现全面否认被革命打倒的旧体制历史作用的倾向。事实上,回头来看,不论是被辛亥革命打倒的清朝政府,还是被国民革命打倒的北洋政府,历史上它们都在恢复主权和推动社会经济近代化上,发挥过各种各样的作用。1949年被革命打倒的国民党政权也是一样的。最近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逐渐得到了客观评价,这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国民政府在日中战争中发挥作用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何理解中日战争,依然是重大课题之一。

[作者久保亨,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历史学的嬗变与日中战争史研究的未来

波多野澄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研究,发生了巨大转变。其特征简而言之,包括“多样性”“多层次性”“跨界性”。“多样性”是指研究方法论、研究对象,乃至进入研究视野中的

人物的明显多样化。“多层次性”指不局限于对特定地域的历史现象,进行单一角度的分析,而利用多层次的分析,来展现、对比多重的历史景象。而“跨界性”,自然是指强调国际化的观点,超越国界、边界和地区的界限。

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那就是尤其重视“对话和比较”,不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闭门造车,而是积极地与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海外的研究者开展对话。比起强调历史事实的特殊性,更着重于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展示“差异与类似”“连续和断绝”之类的观点。

日中战争研究也是如此,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所谓“侵略和抵抗”“统治和被统治”的两分法。20世纪80年代之前,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观(革命史观),在中国史研究中占有压倒性地位,但在之后,客观评价中华民国时期统治模式,军事、政治、社会的近代化和民主化,经济发展等的研究不断增加。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由“革命范式”向“国家建设范式”的转型,背景是对作为大国的现代中国,其民主化和国家建设前往何方的普遍关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体战”这一概念对日本近现代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应对所预期的总体战而建立的强制征用人员、物资的战时动员体制,推进了社会成员的“同质化”“平均化”,划时代地“从阶级社会向系统社会转化”,这一趋势延伸到战后,为社会的现代化做好了准备。

事实上,就是在战争时期,日本也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现象,包括在农村,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出现动摇;在城市,工人的处境得到改善,女性劳动者也进入社会,并提高了地位。

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关注“总体战”带来的社会变化的研究。比如有研究者提出,从日中战争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农村社会对国民政府强制动员大量士兵和物资产生不公平感和不满,因而要求负担的公平性和合理化,这成为促使社会同质化和平均化的推动力,并最终形成承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社会基础。这样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虽然这种导入社会史视角的观点也受到了批评,但确实是突破既往中国革命史研究的新观点。

日本这些新研究认为,土地改革并未与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动员有效结合。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得以扩大势力的原因,这类研究正在修正土地改革吸引了农民投向中国共产党的传统看法。然而,这一有着挑战革命史观意味的研究潮流,并未成功建立新的历史观,也有人批评这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倾向。

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民众动员,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变化,仍然有充分研究的余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只得到有限支持的情况下,却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对此,历史学家还没有给出能够让人完全信服的答案。

不管怎么说,战争的极大破坏性和强制动员(征用),给日中两国的社会和文化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对此仍然有着充分的研究空间。尤其遭受巨大伤害的中国,其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认为对此有必要进行从日中战争到国共内战时期,乃至朝鲜战争时期的长时段研究。

如果举例说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的话,那就是从国际化的视角出发,多方面探讨九一八事变和日中战争的原因、背景。从两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原则和理念、国际规则(民族自决·民族主义、自由贸易、民主主义、战争非法化等)的应对,世界大萧条对国际、国内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等角度开展相关研究也非常重要。此外,日中之间为什么由局部的争执(卢沟桥事变)逐步升级?为什么战争走向了长期化?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大众媒体、舆论、第三国(尤

其是苏联和美国)所起的作用、政治领导人的领导能力等方面,我认为研究也尚不充分,需要进一步努力。

[作者波多野澄雄,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译者张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东亚视角下的中日战争研究

裴京汉

一

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侵台战争和“琉球处分”。不久后的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沦为日本殖民地。1905年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10年韩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对“满洲”(中国东北——作者注)的侵略正式开始。随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就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出来。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史称中日“二十一条”,正是日本妄图将中国变为自己殖民地的第一步。1928年北伐战争期间的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充分暴露日本肆意妄为的侵略活动的残忍至极。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自1905年开始长期扩张侵略中国东北的最终结果,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向全中国扩张。

日本的对外侵略并没有止步于中国。1941年之后,日本制定了南进政策,侵略的脚步也延伸至东南亚地区,维持中国战线和战争不断扩大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资源保障需求成为其侵略东南亚的首要目的。当然,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毫无疑问使其与该地区的宗主国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对立。1941年12月日军进攻珍珠港,以及随之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都是日军侵略东南亚的必然结果。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的对外侵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建造所谓的“大日本帝国”对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在内)进行的一连串侵略战争,而中日战争是日本对亚洲侵略战争中的关键所在。因此,笔者认为仅将中日战争看作日本和中国两国之间的战争或者仅从一国历史角度出发的研究终究还是不太恰当的,非常有必要从东亚视角出发对中日战争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

二

除此之外,东亚视角同样适用于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即对抗日战争或者抗日运动的分析。台湾在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各地开展了激烈的武装抗日斗争,但在日军严酷的镇压下,为数不少的抗日志士转而到大陆继续开展抗日活动。韩国在亡国以后,大批独立运动的仁人志士亡命海外继续